

我的一生



拼綴出的記憶

劉藹南 編著

我的一生



拼綴出的記憶

劉藹南 編著

目 录

第一部 “莲花第一家” ——一支衰而复兴的家族

前言

- 第一章 我的高祖父藻夫公
- 第二章 我的祖父（述九公）与祖母
- 第三章 我的父亲
- 第四章 家族的第一次迁徙
- 第五章 我的母亲
- 第六章 我的大姑
- 第七章 家族的第二次迁徙
- 第八章 我的二哥
- 第九章 家族的第三次迁徙
- 第十章 我的大哥嫂
- 第十一章 我的三哥嫂
- 附一：刘匡南生平事迹
- 附二：刘匡南墓碑文
- 第十二章 我的其他兄弟姐妹们
- 第十三章 “莲花第一家”的后辈们
- 后记

备注：刘述九公第二代、第三代名单

- 第二部 我的一生
- 第一章 投笔从戎 一进福州
- 第二章 参加土改 一进永定
- 第三章 组建家庭 二进永定
- 第四章 省城安家 二进福州
- 第五章 家庭团聚 二进龙岩
- 第六章 家破 1966

第七章	颠沛流离的“回乡”路
第八章	历经万难 三回龙岩
第九章	“学习班”的生活
第十章	一家四散 三离龙岩
第十一章	结束下放 团聚上杭
第十二章	落实政策 四回龙岩
第十三章	科学的春天 三进福州
第十四章	漫漫落实政策路
第十五章	苦尽甘来 光荣离休
附录：	我的简历

第三部 亲情一片深如海 ——故乡行记实

第一章	第一次回乡
第二章	第二次回乡
第三章	第三次回乡
第四章	第四次回乡

附：泽民、丽南的孙子王霄羽习作一篇《我爱莲花的乡下》

第四部 国之瑰宝家之楷模 ——深切怀念长兄刘恢先教授

第一章	我们的家庭
第二章	艰辛抚育两房遗孤 为国培养有用人才
第三章	无微不至关怀一对弟妹 体现“长兄为父”风范
第四章	了却心愿

结束语

附录一：刘恢先教授生平简介

附录二：大嫂洪晶同志生平

第五部 文星陨落 笔花永开
——深切怀念陈慰然同志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附一：在1979年1月16日陈慰然同志追悼会上宣读
的《悼词》

附二：中共龙岩地委《关于给陈慰然同志彻底平反昭
雪的决定》

附三：原龙岩地委宣传部部长刘大夫同志挽联

第六部 光荣离休 实现梦想
第一章 畅游美好山河
第二章 倾力撰写家史

第七部 屋场始祖祠修复及
庐僧、恢先神位安放庆典活动

第八部 丁亥北行小记
——相聚北京、哈尔滨
第一章 “团聚”——验证着社会发展
第二章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北京团聚
第三章 “圆梦哈尔滨”之旅
第四章 “万‘苦’留芳”警示后人

第九部 寻根之旅

第一部 “莲花第一家”

——一支衰而复兴的家族



大团圆（2005年摄于莲花富树村）

前 言

江西省莲花县南陂乡下沿江村，是我们刘氏家族的祖籍地。我祖父刘述九公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从族谱排行来算，属汉朝高祖刘邦的第91代孙。我是刘述九公的长房孙女。

我们家族先辈的历史，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历史，这样看来，我们的祖先也可算是当时的书香门第吧！

在新世纪和新国家的建设中，我们刘氏家族的后辈们已经孕育着新的发迹之势！但是，维系刘氏家族长久的兴旺发达，必须依靠文化的支撑。为了给后辈予启示，为了家族后代的幸福和发达！我记下了这段刘氏家族曾经几代人的历史，而更多更灿烂的历史，要靠我们的后辈去谱写，去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作为刘氏家族成员之一记录这段历史的初衷。

我们这一代的兄弟姐妹们曾经骄傲地认为：没有哪一个家庭能像我们这样团结和谐和步调一致，真正作到“一呼百应”。在二十世纪末，刘述九公的后辈第二次大团聚中，为我们做现场录像的莲花县电视台的同志，曾为我们这个家族的亲情所感动，脱口盛赞我们是“莲花第一家”。我想，我们刘述九公的子孙后辈们，是会珍惜这一荣誉的。

第一章 我的高祖父藻夫公

据族谱记载：在宋朝初年，我们这个家族的第一世祖公——克都公，自安福县的密湖迁居到了莲花县南陂的屋场。克都公生有三子，其二子昌祖公就是现在我们这一脉刘氏家族的祖公。

此后，克都公第二十六世子琅（即雅康公），从屋场迁居到了沿江，雅康公即为沿江刘氏家族的始祖。雅康公生有九子，我的高祖父藻夫公排行第二。

在我儿时，曾听父辈说起我们刘氏家族祖先的历史：

当年，在雅康公去世时，请来风水先生看墓地。几经察看，风水先生选中一处，并称该地风水甚好，于子孙后代大有发迹，只是有亏于二房。沉凝之际，我的高祖父——二房祖公藻夫公挺身而出，当场表

态，只要风水好，对得起祖先，况与诸房（藻夫公有兄弟八人）有利，只亏我二房，则不必迟疑，可以定夺。雅康公于是得以顺利安葬，皆大欢喜。

可若干年后，不知是风水先生谬语所至还是巧合，我高祖父这一脉刘氏家族连续五代确有所招损，因而自祖辈上就有“亏二房”的说法：先是藻夫公一脉连续二代单传和早逝，即藻夫公一脉单传给小庐公，小庐公一脉单传给述九公（即我的祖父）；后因藻夫公早逝，小庐公亦悲伤过度早逝；……。

第二章 我的祖父（述九公）与祖母

高祖父藻夫公^{曾祖母父}去世后，曾祖母改嫁，只留下年仅三岁的祖父和高祖母（即藻夫公夫人）。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势单力薄，在封建社会的农村里，颇受乡里旺房的欺凌，以致田产逐渐流失，家境日渐清寒。



我的祖父母
(1938年于莲花县南陂乡下沿江村“上新屋”系大哥恢先从美国回国时所摄)

但祖父述九公深得高祖母教诲，却年少志坚，喜爱读书，竟在乡试中一举考中秀才。由于家境贫寒，祖父述九公虽已到婚配年龄，却四里八乡无人愿意上门。后得热心人说合，远在数百里外的吉安府，有一官府人家，竟能在“重人才不重家产”的选婿原则下，愿将其尚在闺阁中的小姐嫁于我祖父（这位小姐，后来就成为了我们可敬的祖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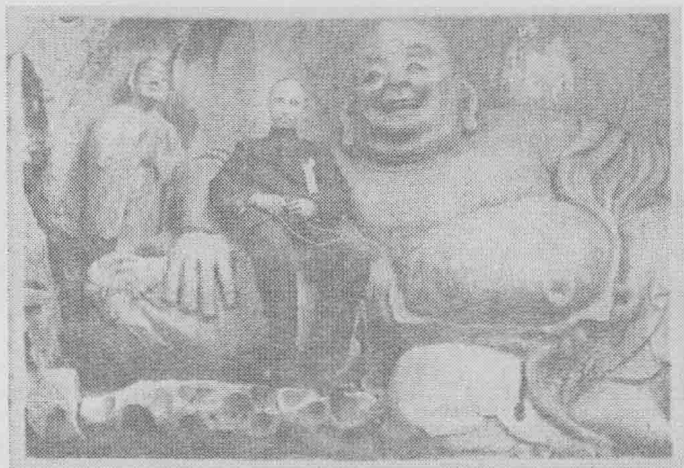
当年，我的祖母只身一人携带丰厚的嫁妆，从相对繁荣的州府所在地，下嫁到湘赣边界莲花小县的偏僻山村且名不见经传贫困的祖父家，这是在封建社会甚至是现代都属颇为罕见的婚姻。因而，也成为四里八乡人们常谈论的佳话。

我祖母的到来，为藻夫公这一濒临衰亡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祖母虽然出身于吉安府的官府人家，但她勤于持家，善待四邻，更可喜的是竟然连生五子二女，俗称“五男二女七子团圆”。从此，藻夫公这一脉开始人丁兴旺，有了发迹的趋势。

但是，由于人多田少，家庭仅靠我祖父述九公一人的私塾收入，生活仍颇为艰辛。为维持家计，祖父不得不弃家进山做纸，并携长子庐僧（即我的父亲）随行就读。随着祖父的离家，家中仅靠祖母支撑和料理。

作为前清秀才的祖父述九公，给我们这一辈后代留下的族记就是“南”字。所以，在我们这一辈，无论男女，都以“南”字作为名字的符号。在中国封建史上，无论男女都以一个字作为名字，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从这里，就已足见我的祖父以他的智慧，对传承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做了很好的扬弃！

第三章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1947年摄于杭州灵隐寺)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父亲也到了该谈婚论娶的年龄了。作为长子，自然是这个家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无独有偶，同在百里之外的吉安府也有一位彭姓官府人家看上了我父亲。这位官府千金（就是后来成为我母亲的彭燕德）自幼丧母，彭家视这位独生女为掌上明珠，年至二十有四却尚未婚配（这在当时亦属罕见）。彭老先生爱惜我父亲庐僧为人正直和勤奋好学，遂不惜以丰厚的嫁妆令独生女远嫁莲花偏远的山乡，其时亦是“千里送千金”，足见当年我的外祖父择婿之严厉。

在封建社会的偏远山村，尤其是藻夫公这支曾经濒临衰亡的家庭，长子成亲拟隆重操办，也是属情理之中的事。但由于当时祖父家境贫寒，竟连一间新房

也没有，全家十几口人挤在祠堂的偏房，实在不象样。不得已，我祖父倾力置办了一桌酒席宴请乡里族长、豪绅，希望能够借此商借一间小房权作儿子的新房。岂料，席后众人各自抹抹嘴角，一声不吭地就走了，这真叫“捉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没奈何，祖父只好将仅有的一间旧房一隔为二，权作父亲的新房。

一个闺阁大小姐就在这样的陋室内成亲，此事对我父亲的刺激太大了，因此，他发誓一定要建一座自己的住宅！

借助我母亲陪嫁的资助，婚后，父亲去了省城江西林业专科学校念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庐山森林局的苗圃（现庐山植物园的前身）当技术员。他省吃俭用，将仅有的一点薪水积攒起来寄回家乡，决心盖一栋住房，以摆脱家人寄人篱下的窘迫状况。

中国封建社会有史以来，尤其在农村，建房不仅是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大事，更是一个家庭成家立业的大事。我祖父家原居住的地方是南陂乡的下沿江村，这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落，但由于祖辈常年受到大户人家的欺凌，因此，父亲不愿将房子盖在那儿。而上沿江村多为贫苦农民，且有一些与我们家有密切的来往。于是，在择地建房时，我父亲就将新房的房址选择在靠近上沿江村并稍远离下沿江村之间的一块坡地上。

当时，全家仅靠我父亲一人在外攒钱、筹备建房款，而二叔则在老家负责建房。岂料，当新房建成并被人们尊称为“上新屋”时，二叔却因积劳成疾不幸早逝。

其时，他膝下只有一女，她就是我们的大姐——玉南。二叔临终前搂着玉姐，流着泪不无遗憾地说：“你为何不是个男孩？！”此时，在一旁的父亲牵过

我三哥让他跪在二叔病榻前，并说：“把这老三过继给你作儿子吧！你可安心去了”。于是，我的三哥就这样过继给二叔了，玉姐从此也就把我三哥视为自己的亲弟弟了。数十年后，有一次我大哥在与我谈起老家那栋“上新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二叔对建房是有功的”。我不禁惨然联想，这是否应了“亏二房”的传说，还是巧合呢？

作为祖父述九公的长子，我的父亲对内孝敬父母，对一母同胞重手足情，对晚辈爱护备至，成为维系我们家族发展的唯一“台柱子”；在外工作，他勤勤恳恳、精益求精，仅靠只有林业中专学历而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后台，竟能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中从一个庐山苗圃的普通技术员，升任庐山森林局局长之职，足见不易！当年，我父亲曾为现今被称为庐山植物园的建设做过一些贡献，至今，在植物园内著名的“三棵树”景点附近，还留有他的巨石摩崖。此后，他又调任江西省财政厅第一科科长，直至升任省田粮处副处长之职（处长为省财政厅厅长兼任）。



我的父亲刘庐僧（中）、三叔（右）与四叔
（1958年摄于莲花富树村家中）

1947年，我父亲在大、三哥的劝说下，表示不愿再为蒋家王朝卖命，辞去了省田粮处副处长职务，赋闲在家。但当时，他对国民党的假民主还存有一些幻想，于是在乡人的鼓励下，回莲花参加了国大代表的竞选。此后竟在全县层层竞争中，当选为莲花县“国大代表”。解放前夕，他矛盾重重，既不愿意再跟随蒋政权去台湾苟安，又对党的政策不了解，因而只身逃往香港九龙。1950年，在党的“城市八大政策”的感召和大、三哥的劝说下，我父亲终于下定决心弃暗投明。

回国后，他立即向南京市人民政府投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并住在当时三哥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气象研究所宿舍。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及1952年土改运动中，他受到关押和判刑。1958年释放回家乡后，随我三叔一同生活，直至1969年病故。

1982年，党中央在落实“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政策中，也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重新落实了政策。经复查，确认我父亲为投诚人员，立即撤销原判决，并发给投诚人员证书，归还原没收的位于南昌市一纬路的私人住宅（我们感谢党和政府，也告慰父亲于九泉）。鉴于当时该房已作为江西省政府的干部宿舍，省政府办公厅认为不便归还原屋。为体谅政府的具体困难，我们子女同意在归还产权以后，按当时政府的有关规定折价卖给省政府。

我父亲虽身为国民党的政府要员，却没有与其同流合污。他勤俭廉洁、清贫一生，抱着“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培养子女、侄辈读书，以期获得一技之长，自食其力服务社会。他的这些思想，对后辈们的影响极大，我们兄弟姐妹都十分怀念他。

第四章 家族的第一次迁徙

作为这个家族新的“台柱子”，父亲到南昌工作后，就想方设法，要将祖父述九公的整个家族逐步迁移到南昌定居。这是我祖父家族第一次的集体大迁徙（当时，一个家族的整体迁徙，却完全靠我父亲一人的努力，作为一个特例，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是不常见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父亲传统的儒家思想意识）。我的家族集体离开老家迁到南昌后，一家老少几^二十口，经济条件非常困难，三叔、四叔只得到杂货铺里当学徒。后来，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学到了一些记帐和会计的基础知识，遂转到银行当见习生直至任会计，最后他们俩都升任县银行行长，家庭的经济条件才开始逐步好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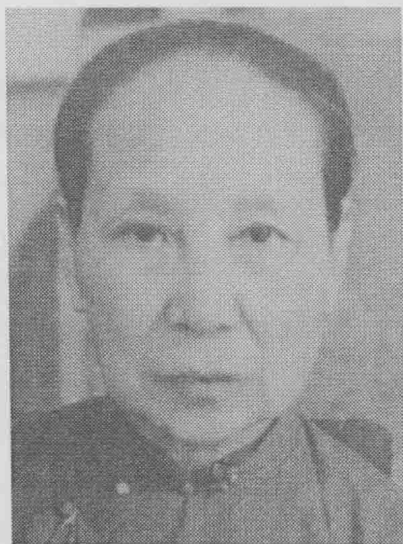
这时，由于家族的不断繁衍，成员也在不断地扩大，我有了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三叔已生有一子一女；四叔也有三女一子。各户人口都增加了，只能租用民房分散居住。对于一个长期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家族来说，的确感到十分地不方便。

为更好地侍奉长辈、团结兄弟和维系家族的发达，我父亲借助于当时南昌开发城北新区的机会，利用低息贷款的优惠条件，率先在城北一纬路，建起了一座假三层的住房（后发展成五纬、三经，并建有城北公园，现为江西省委、省府的机关宿舍），全家人相继喜迁新居。至此，祖父述九公的整个家族又重新聚集在一个屋檐下。

当时，我的祖父母身体非常健康，大家庭祖孙、叔侄、妯娌、兄弟姐妹相聚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虽不富裕，但生活相对稳定，是这个家族最难忘的好时光。

其时，大哥已去美国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二哥随五叔去了日本，靠着五叔考取的公费留学经费，二哥先攻读日语半年，后考取了当时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家里除三哥还在念中学外，其余兄弟姐妹七人均在小学读书（计有芳、甘、香、蔼、孺、闰、美等）。

第五章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彭燕德
（拍摄时间不详）

祖父述九公膝下有五子二女，但是都没有分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我的母亲尽管是个三寸金莲的大家闺秀，但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长媳，她却义无反顾地接过了祖母交下的职责，操持整个大家庭内务的重任。至今，我都无法想象她是如何操持这个大家庭和处理那些复杂关系的，我只粗略知道，首先是十几口人的吃饭问题。面临着旧农村的大锅大灶，她那双小脚无法站立，只能搬个木凳，在上面铺上棉絮，跪在上面炒菜做饭。长期这样操劳，使得她的双膝都长满厚厚的老茧。随着我的二婶和四婶的相继娶进，加上原来作为童养媳后来成为我的三婶等三位妯娌的帮助，担子轻松了许多。我母亲作为长嫂，善待诸位妯娌和小姑，而妯娌和小姑也对我母亲倍加敬重，总是一口一个嫂嫂。

在旧社会，农村家庭的衣、鞋等多是家人自己缝制的。由于家里有四个小叔和两个小姑，每到春节前，我母亲就要筹备拿出陪嫁的布匹等，为大家缝制新衣和鞋，直到除夕夜，才得空给自己的两个儿子（我的大哥和二哥）缝制衣鞋。我母亲也因此得到祖母和家人的赞赏。为营造这个大家庭特有的温馨与和睦，这里面有我母亲很大的功劳。

抗战八年，我母亲跟随父亲东奔西跑，到处逃难。当时逃难的路线是：南昌—吉安—泰和—赣州—泰和—兴国—宁都—南昌，真是吃尽了苦。我母亲除照顾我们一家外，还要照顾几个在外念书的堂兄弟姐妹，因而，抗战期间我们的大家庭虽然分散了，但堂兄弟姐妹还常相聚，大家互相关照，情如同胞。感情深厚。我的父亲一辈子感恩于我的母亲，正因为有我

母亲，才给了他一个在外打拼的稳定后方。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的一生，尽心安抚着我多难的母亲。每当工作之余，他总是依在我母亲身旁，一口一个“燕德”、“燕德”，给她以温暖与爱护，可不知为什么，我母亲却总是默默无言以待。这在当时旧婚姻中实属罕见。我无法理解我母亲那颗破碎的心！她吃的苦太多、太多！



我的父母与我、孺南和华泰
(1946年摄于南昌)

抗战胜利了，我和我的弟弟也离开了母亲前往上海念大学。此时，她的五个子女都没有一个留在她身旁，对于二老来说，备感孤独！直到解放初，我父亲去了香港，还不忘托人把我母亲和我二哥的遗腹子（即华泰）送往南京中央气象研究所随我三哥生活。